

徐向前长征路上的重大抉择

1931年,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,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。这个时候徐向前正担任红四军军长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。作为红四方面军中的高层领导成员,张国焘与徐向前“搭档”数年,直至长征中,两人的关系到了命运转折的关节点上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,徐向前既要拥护中央北上决策,但又不愿红四方面军分裂为两半……那么,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,徐向前是如何做出艰难而明智的选择的呢?



▲ 徐向前

张国焘野心初显,红一、红四现裂隙

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,因为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,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、不重视、不尊重他的意见,有时还用各种手法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。徐向前总感到压抑。红一、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,给徐向前提供了机会。他希望借两军会师,能离开张国焘到中央工作。但是,谁也没有想到,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,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,两大主力红军之间出现了裂隙。

客观地说,一开始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,会师之前对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。但是,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两万人之后,他就开始不安分、不平静了。他拥有4倍于中央红军的实力,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。

两河口会议后,中央派出李富春、林伯渠、李维汉、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。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,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、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,要求军委设常委,决定战略问题;徐向前、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,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,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。因事出突然,又事关大局,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汇报。未等中央答复,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: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,朱德任前敌总指挥,周副主席兼参谋长。”与此同时,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

求。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,带兵在前线担任

开路先锋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。有一天,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:“我这人能力不行,在四方面军干不了。现在中央来了,有不少能人,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,他是军事理论家,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。”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,感到十分突然,急忙问道:“那你呢?那你准备干什么去?”徐向前诚恳地说:“我到中央去,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,反正是能力有限,做点具体工作吧!”陈昌浩坚决不同意。可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,拿定主意要走。

张国焘公然对抗,形势严峻

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野心,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。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,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做适当让步。

1935年7月18日,中共中央对中央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,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,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。3天后,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,以徐向前兼总指挥,陈昌浩兼政治委员,叶剑英任参谋长。中央还做出明确规定: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”

7月中旬,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,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。

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齟齬,特别是张国焘、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,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职务问题,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。但是,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过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。毛泽东有个生动的比喻,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“母鸡”。

不久,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,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进。

对于北上这一原则,徐向前态度鲜明、立场坚定,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

焘的距离。

8月21日,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。到达班佑后,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。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,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、第三十军,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,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。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,批准了他的建议。

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。包座之战,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,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,并肩闯陇。可就在这时,党内又起风波,实际控制左路军的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。

“屯兵于此,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。战机一失,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,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。唉,那就麻烦了!”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毛泽东也很着急。9月1日,他与徐向前、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、朱德,详细、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,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。

两天后,张国焘回电,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。

在关键时刻,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,同意部队南下,倒向了张国焘一边。

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。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,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,但他更不愿意的是分兵,他不想看到红一、四方面军分兵,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。在这种情况下,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。

事隔不久,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,劝说、命令均无效,党中央率一、三军团单独北进。临行前的9日晚,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,在院中见了徐向前。他问道:“向前同志,你的意见怎么样?”

徐向前直言相告:“两军既然已经会合,就不宜再分开,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,恐怕不好指挥。”听了他的回答,毛泽



▲ 1937年叶剑英(右)和徐向前(左)在陕北合影

东没再说什么,默默地点了点头,呆了一会儿,就走了,并且连夜率三军团出发,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。

两军会合后,徐向前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,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。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,陈昌浩又紧随其后。可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,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,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。

徐向前表立场:红军与红军闹什么劲

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,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。徐向前回忆说:“那天早晨,我刚刚起床,底下就来报告,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,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。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。接着,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,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发,还放了警戒哨。何畏当时

在红军大学,他跑来问:‘是不是有命令叫走?’陈昌浩说:‘我们没下命令,赶紧叫他们回来!’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,使我愣了神,坐在床上,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。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,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,我们毫无思想准备。前面有人不明真相,打电话请示:‘中央红军走了,还对我们警戒,打不打?’陈昌浩拿着电话筒,问我怎么办,我说:‘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!叫他们听指挥,无论如何不能打!’”

中央红军北上之后,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,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。徐向前坐在一个角落里,表情严肃:“吧嗒吧嗒”地猛抽烟,一言不发。

会后,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。徐向前明确地表示自己不赞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。他说:“红军与红军还闹什么劲。党内有分歧,谁是谁非,可以慢慢地谈,总会谈通的。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,开除这个,通缉那个,只能使亲者

痛、仇者快,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,我们也不能这样搞。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,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!”徐向前的仗义执言,使张国焘无言以对。

1935年12月,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,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取消张国焘第二“中央”的指示,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行动。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的肯定,实际意味着对张国焘的否定。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,陈昌浩也开始转变。在这种形势下,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,只好复电张浩,表示“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”,遂引军北上,第三次穿过草地,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。

大浪淘沙。徐向前与张国焘这对“搭档”在历史的大潮中,在长征这一非同小可的革命征途中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,最终走向迥异结局:一个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,另一个投敌叛变、最后在国

外凄凉死去。(孟红)